

# 明朝滇南地区移民开发与民族关系变迁研究

## ——以石屏州为中心的考察

白依格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5)

**摘要:**以石屏州为个案,探讨明代滇南地区移民政策与边疆秩序重构、文化融合之间的动态关系。明初大量汉族先民奉命“填南”,来到滇南石屏州后,采取了系列措施,如屯田开垦和水利治理等,对石屏州地区进行农耕经济开发,同时也使传统耕读文化在此生根。明中叶当地汉族士绅成功移植了中原地区基层治理模式,改变了基层社会长期为土酋控制的局面。随着屯垦向山区发展和改土归流的大力推进,当地资源承载力的先天不足和移民增加造成生存空间挤压的问题日渐凸显,明末清初当地的人地和民族矛盾达到顶峰,在有司有效治理和汉族二次移民“走西头”的影响下,当地的人地矛盾最终得到缓解。同时在汉族移民的向心力主导作用下,清初滇南石屏州也逐步走向民族融合、文化共兴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明朝汉族移民;滇南石屏州;移民秩序构建;民族融合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128(2026)01-0128-06

目前学界对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古籍资料和地方文献,对移民的类型、方式和数量、移民的分布状况、带来的影响及汉族移民如何土著化等问题进行了探究。总体来看,当下研究主要聚焦于云南整体来展开论述,而相对忽视了滇南边疆,尤其是土流交界地区入迁汉族与当地土著之间民族关系和秩序构建间的嬗变。“民族的迁徙就是文化的迁徙”<sup>①</sup>,移民与土著间的关系变迁研究,实质上就是对迁徙民族如何根据异时异地的条件变化,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扬弃及重构,以及与周边土著民族进行文化互动的研究。在此方面,相关研究主要着眼于迁入汉民和原著民之间的“土客之争”,强调迁入汉民与当地土著居民间的斗争和隔阂。本文尝试转变研究视角,从明初汉族移民入滇的史实入手,以石屏州异龙湖流域为中心进行表达。伴随着当地多民族长期生活和共同开发的影响,汉族移民也在“孤岛文化”的向心力吸引作用下,开启了以“我”为主的改造周边土著民族文化的行动,进而推动了民族融合“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

### 一、移民前的宁静:土著安居的石屏州

云南自古就是人口流动密集的地区。从历史上看,滇南石屏州多民族聚居的特征亦十分明显。从

地理位置上看,此地“在南交境……云南去中国万里,石屏地在极南,五帝以前书契未立,貌不可稽已……临安与交址接壤,本舟亦在疆域之内”<sup>②</sup>。据载,世纪之交石屏全境面积为3037平方公里,大都为山区,平坝不到十分之一,从宝秀到坝心是石屏的平坝主体区域,总面积只有162.34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5.53%<sup>③</sup>。常有俗语描述石屏地貌“九分山有余,一分坝不足”。而如此地势地形天然便有助于形成一种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环境。在这极为有限甚至狭小的平坝中,旧时却分布有三个湖泊,即上端的赤瑞湖,中部的鉴湖,中下部的异龙湖,平坝四周青山叠嶂,清流不绝,使三湖一年四季碧波荡漾,水汽蒸腾。

据载,一亿年前,喜马拉雅山的几次强烈造山运动,形成了高原湖泊异龙湖、赤瑞湖<sup>④</sup>。湖中烟波浩渺,明初尚有五岛,至明中后期,湖水渐缩,有两岛脱离水域,与湖畔山体相连。赤瑞湖因其“水色早晚赤如丹砂,经月余”<sup>⑤</sup>,故将此湖定名为“赤瑞湖”。赤瑞湖是宝秀盆地古老基底的北西向断裂复活后,新近系地层发生拗陷积水,形成的半封闭型淡水湖泊,为石屏富营养性的第二天然湖泊,亦是宝秀坝的蓄洪水库<sup>⑥</sup>。元明以来,异龙湖、赤瑞湖水位下降,异龙湖流域出现了大量海肥浸润的优质土地。从密林覆盖到水位下降、湖田显

① 苍铭:《云南民族迁徙文化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第1页。

② 康熙《石屏州志》卷一《沿革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第40页。南交:石屏地处中国疆域之南,与交址(今越南河内以北)接壤。

③ 《石屏县志》第二编《环境人口概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447页。

④ 冯子望主编《石屏县水利志》第一编《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第11页。

⑤ 乾隆《石屏州志》卷一《天文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第32页。

收稿日期:2025-04-28

作者简介:白依格(2000—),女,云南蒙自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城市史。

露，如此环境变迁为明时大量汉族移民迁入此地进行屯垦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

石屏地处亚热带气候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立体气候十分明显，自古就居住着傣、彝、哈尼等土著先民。此地汉族移民到来之前，先后由傣、彝、哈尼等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迁徙至此。当地盛传着许久之傣族先民与赤瑞湖龙王结为亲家的古老传说<sup>①</sup>。

考古资料显示，在位于红河中下游流域的河口孤山洞一带曾发现距今约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据考证他们是居住在河口、越南、广西一带的百越部落祖先，而百越部落正是石屏傣族先民的祖先。约三千多年前，由于红河、异龙湖水的消退，习性好水的傣族先民，溯红河而上来到红河流域今红河岸边的石屏地区居住，并且有一支来到宝秀坝所在的赤瑞湖畔定居下来，这是宝秀坝子所到来的第一批移民。

至西汉之时，石屏土著“旧欣人”<sup>②</sup>（今彝族）便走出密林，聚居于今天异龙湖和赤瑞湖边，开发、利用土地，生息繁衍<sup>③</sup>。此时“旧欣”尚是“山麓林水之边”即一大片海子和原始森林，有少数彝族先民在山林中狩猎采集游耕、穴居，尚不存在村落集镇的雏形。据彝族民间彝文古书《笃姆躲雨枝》<sup>④</sup>记载“沐呃鲁额枯，味能鲁筑业。阿仆笃姆恒，号书鄂平刚”，翻译成汉语是“天生石溶洞，红烧石林带，阿仆笃慕屋，自古如是说”，也就是说彝族祖先经过了漫长的在山林中狩猎采集游耕的生活，终于走出洞穴，开始建盖土掌房。这段时间大致在先秦的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对应石屏地区即为青铜器时代，此时部分彝族先民已经来到异龙湖、赤瑞湖畔，并将原本定居在此地的傣族驱逐至红河岸边<sup>⑤⑦⑧</sup>。

在彝族之后第三批到达石屏州的土著先民为哈尼族。在哈尼族村寨内流传甚广的古老口头传说《哈尼阿培聪坡坡》中讲“先祖们”一直在寻找一个哈尼人居住的天堂——“诺玛阿美”，那里气候温和，雨水均调，庄稼茂盛。在那里，哈尼、彝、傣族先民是“亲亲的一娘生的兄弟姐妹”“女人们共操一架纺车”“男人们共扶一把犁耙”“寨里的头人不要别处的，退出自己的头人管自己”<sup>⑧</sup>。据考证，正因为异龙湖及临近赤瑞湖畔等地山川秀美

湖泊迷人，像极了史诗中所述的“诺玛阿美”，于是哈尼先民决定在石屏异龙湖、赤瑞湖畔的红河南岸定居下来<sup>⑧</sup>。另据考古资料显示，在南诏国建立（公元737年）前后红河南岸还在处于原始社会时期的石屏土著先民们便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此时“异龙湖边的居民以打渔为主，兼狩猎与农耕，山区居民狩猎与农耕并重，种地刀耕火种，已会开田使用牛耕，使用了铜器和铁器，建立了村寨和房舍，打造了船只和渔猎工具，出现了家禽饲养，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会进行以部落为单位的迁徙”<sup>⑨</sup>。

据《哈尼阿培聪坡坡》记载，哈尼先祖到达异龙湖畔时，曾与此前便在此地定居的彝族、傣族一起共处生活。当时的哈尼族社会尚处于氏族部落阶段，生产劳动以耕田种地为主，他们在部落酋长、山官头人的组织下，利用向阳山坡的水利之便，创造性地将坡地改造为水田，在水源附近建集镇、村寨修水渠，沿水渠修梯田，梯田较之坡地保水保肥，收产高产，利于生产发展。

总体来看，在元明开辟屯田移民之前，石屏社会处于西南地区历史经济开发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期<sup>⑩</sup>，即从原始社会形态向封建政权建设的过渡时期。此时以傣族为主的族群在靠近河川的平坝和山脚地带出现了小范围内的定居农业，以哈尼为主的族群已开始沿山地向阳面引水造梯田。在这个阶段，石屏境内山地森林密布、人迹罕至，生产方式以彝族先民（旧欣、乌蛮）等在山间刀耕火种、狩猎采集为主，也就是所谓“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sup>⑪</sup>。

## 二、移民后的喧嚣：明清汉族移民迁入与初步开发

明初云南的形势是：“东北贵州，东南交趾；西南缅甸；西北吐蕃；东南以元门为门户，石屏咽喉之地也。”<sup>⑫</sup>且当时的石屏州，地理位置处于阿剌万户府治下，在各路土司的包围之中，是围绕红河两岸代表中原王朝的流官州衙权威与地方土司权威的交界地带，是明王朝欲控制滇南地区的必争之地。由于石屏州的特殊地缘战略意义，明初在临安府设立卫所的基础上另置石屏坝、宝秀坝等地屯兵，从而形成以汉族移民为主体的军屯进驻的局面。此举对

① 刘黎明、苏佛涛：《普胜和龙女的传说》，转引自孙官生《石屏通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第71页。

② 石屏在秦汉以前称“旧欣”，意为“山麓林水之边”；“旧欣人”是开远腊玛古猿和蒙自马鹿洞人的后裔，在石屏南北两边山区定居后，发展为今天石屏彝族的两大支系：尼苏支系和花腰支系。

③ 石屏县土地管理局编《石屏县土地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第2页。

④ 本书名意为：洪水与笃慕。

⑤ 孙官生主编《石屏文献名邦大百科全书·下卷》第二十五篇《历史的足音——专题篇》，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第55页。

⑥ 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第278页。

⑦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2011，第2605页。

⑧ 乾隆《石屏州志》卷八《兵防志》，第581页。

于实现中原王朝对滇南进行军事统摄、进而“以夏变夷”，实现文化辐射的治边国策具有重大意义<sup>①</sup>。

第一批到来的汉族移民，是洪武十五年（1382）随沐英南征，平息了澄江、临安、各州县，随即留在石屏州屯戍的军人<sup>②</sup>。由于当时受明廷征召的军屯及其家属皆以“中土大姓”为主，其籍贯大都在应天府一带，当地无论汉彝都常有“南京柳树湾祖先移民”的传说。据访谈者口述：“小时候听老祖宗讲故事，总说我们老祖祖的老祖祖，是从南京来到宝秀的。长大以后查阅文献终于知道，由于明洪武初年皇帝打算扩建都城，起初受财力物力限制没能继续，十五年又继续施行。当时柳树湾一带也在扩建的范围内，而柳树湾一带驻防部队——前为羽林左卫，后为金吾前卫的驻所，后来皇帝出兵云南，这些驻地被夺的军队也被派遣随军出征了，再之后他们就来到石屏军屯，在宝秀十二营盘一带落地生根了。”<sup>③</sup>文献记载，最初到达此地的军队曾在“杨柳湾”集合。而实际上，明初到石屏州军屯的汉族移民，不仅如《州志》中所载来自“中土大姓”或“江南氏人”，且是从南京“杨柳湾”（如今南京地图上已无此地）出发前来。

史载：“十六年，马黑奴叛乱被明军所平定自缢而死，明军平滇，留沐英镇守云南，明军屯田解决粮饷救济的困难，在石屏置有宝秀屯、五亩屯、石屏屯、梅冲屯、左角（所）屯，共三十四伍。”<sup>④</sup>且进一步完善石屏各区域的州衙设置，“设知州、学正、训导、吏目、巡检、驿丞各一员，巡检名为宝秀巡检司，巡检驿丞名为宝秀驿丞，盖驻宝秀”<sup>⑤</sup>。当时，太祖准沐英屯田奏折，于石屏州置石屏屯十六伍，宝秀屯十八伍，安营扎寨进行屯垦。明军将卒共170人，每人授田20亩，供给籽种3石2斗，实交军粮官仓22石8斗<sup>⑥</sup>。此外，为了供应军队粮饷，朝廷又“募盐商于各边开中”<sup>⑦</sup>，又令开荒三年不上田赋，用生产的谷米就地换取官盐贩卖，此类赋田则为商屯。

洪武年间迁入石屏的军屯规模并不大，史载：“石屏之盛，由沐军留屯江南大族，辟新天地，始

有今日，而其余之移至者，亦屡见之。”<sup>⑧</sup>明初设置临安卫，在石屏则分设石屏、宝秀等屯，“附郭什九屯田，额征屯粮八千四百余石”<sup>⑨</sup>，且“屯军皆江南北人，与土著之民错杂而居”<sup>⑩</sup>。洪武年间第一批到达石屏军屯的明军以“伍”为基本单位，共屯田三十四伍，一伍人数在5到7人，三十四伍即170到238人左右。十二营盘之一的盘营<sup>⑪</sup>素有这样一个传说，据说：“明军来到以前，宝秀主要为土著彝人所居，主要为彝族、傣族，当时十二营盘周围主要是湖泊和沼泽地，多数人居住在山麓或是半山腰，房屋主要是用泥土筑成的土掌房，受地理环境限制无法在初期就大规模屯戍。”<sup>⑫</sup>

第二批以民屯为主的移民则占据了明初石屏汉族移民的绝大部分。史载：“十七年，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sup>⑬</sup>洪武十七年（1384），明王朝移至石屏的中土大姓，主要是来自当时安徽、江浙等地的汉族居民。自此，大量汉族迁入石屏，他们带来了汉文化及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工具并使得传统耕读文化在此地生根发芽，使得石屏州的习俗渐与内地相同<sup>⑭</sup>。另外还有大量官宦、商人、遭贬谪者、逃避祸乱者、谋生者先后来到石屏落籍，他们是民屯的重要成员。他们主要分两个时段到来，第一批是明初由朝廷主持的集中大规模军队移民和此后至清前期分散零星到来的军队亲属。与军屯不同，第二批到达石屏的民屯和商屯移民，则对当地的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变迁起到转折性的影响。

表1 石屏州（县）明朝人口统计表<sup>⑮</sup>

年份	户数	人口	史料来源
洪武元年（1368）	938	6020	乾隆《石屏州志·户口》
正德元年（1506）	1293	11670	
嘉靖元年（1522）	1518	18375	
万历元年（1573）	1551	18097	

据表1可知，从洪武至正德年间石屏州人口陡增，在此期间内石屏州的户口数增加了三百多户，人口数相比洪武元年（1368）尚未平叛之前增加了近一倍。而洪武元年（1368）的人口数量实质上不会多于汉民到来前当地土著居民的人口数量。

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和户数的增长，主要是由紧

① 刘永刚：《基层政治变迁中的权威、自主与制度——近百年云南宝秀镇为中心的表达》，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5，第41页。

② 《石屏县志》第一编《大事记·明朝》，第8页。

③ 与卫汉骞访谈，访谈地点：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异龙镇焕文路某饭店，访谈时间：2021年2月日中午1点46分。

④ 民国《石屏县志》卷三《沿革志第三·近古时期》，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第31页。

⑤ 嘉庆《临安府志校注》卷十七《兵防志》，云南人民出版社，第143页。

⑥ 张廷玉等：《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下·盐法》，中华书局，2013，第1935页。

⑦ 涂时相：《石屏宝秀屯仓政记》，载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志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

⑧ 乾隆《石屏州志》卷一《风俗》，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

⑨ 宝秀十二营盘之一，离滇南茶马古道关口仅两三公里，村人受沿途来往的商人影响，农商文化意识较为浓厚，盘营在十二营盘中格局中等，当下住户约两百户，八百多人。据卫汉骞口述，明初明军入宝秀屯兵时，盘营的军头叫盘自申，带着肖、余、赵、莫、李、吴、梁、刘等士兵到此地屯驻垦殖，后来刘姓搬到赤瑞湖边的小田坝心，其余七姓一直在此地繁衍生息。与营名相称，村中人酷爱下棋，棋趣永存。

⑩ 与卫汉骞访谈，访谈地点：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异龙镇焕文路145号，访谈时间：2021年2月日早上11点25分。

随军屯其后的“中土大姓”大举迁入导致的。正德元年（1506）到嘉庆元年（1796）该地也出现了人口数量的陡增，但与前一个增长期不同的是此阶段内户数并未有大量增加。这是因为此阶段内不再有大量外来移民迁入。而已迁入的屯民不断开发湖滨，使得“输屯储养临城卫军，力耕敢斗”<sup>①</sup>从而促进了当地人口增长。但是随着耕作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剧增与当地宜牧山地多而湖滨耕作坝区少的“田多瘠薄”的农业条件，使石屏州异龙湖流域的人地矛盾逐渐凸显出来<sup>②</sup>。故而从正德元年（1506）到嘉靖元年（1522）的短短十几年中，受地区发展条件限制，当地的人口出现逆增长的发展趋势。见表1。

### 三、移民开发的瓶颈：土客矛盾和阶级矛盾凸显

从明初到万历年间，以汉族移民屯田对异龙湖流域的开发，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也导致生态失衡和人地矛盾激化。据载：“（万历）异龙湖水周遭百五十里，民田相错湖滨者几万顷，田高湖卑，浮沙四塞。土民筑坝希灌溉之利，湖水不得行；渔者排桩积葑草为梁，湖水又不得行，于是壅而上侵。”<sup>③</sup>长期的沿湖垦殖和筑堰围坝，加剧了异龙湖水道壅塞和泥沙淤积<sup>④</sup>，淤积的直接结果导致“屯田逼草海，雨集辄为巨浸”<sup>⑤⑥</sup>。在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逼迫下，土地开垦逐渐扩展到山地丘陵地区，而这些地区世代为“屏中彝人，有土僚、山苏等”所居住，以占石屏境内彝族总数45%的山苏人为例，其“性多柔软，住深箐中，不耕田，开山地中莽裨度日，编竹器生理。衣麻布，婚无媒约”<sup>⑦</sup>。

明中期“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对当地的生态平衡和经济作物生产都产生了不良影响。况且万历之前石屏此地已然“夷民生齿凡十倍汉民”<sup>⑧⑨</sup>，长期采用原始耕作方式直接加大了山区的水土流失，再度加重异龙湖和赤瑞湖因垦殖筑堰已然严重的泥沙淤积，最终导致异龙湖流域的生态破坏。至明中后期，由于河湖水利堵塞、蓄洪灌溉不畅已成大害。故而，以疏浚海口为中心的异龙湖水利工程和改变山区彝族的原始耕作生产方式，成为明中后期官员士绅治理当地的棘手要务。由此，改土归流

和统一山区彝民山林作业管理的历史也开启了。

自明初始屯田到明中后期当地完成中原基层治理模式移植期间，汉族移民在较为安稳的外部环境下对石屏州坝区的农垦事业不断开发，并且当地士绅阶级不断壮大亦逐步扩大土地兼并的规模，至宣德年间皇帝听从石亨建议“罢团营”之后，滇南边疆的军屯实务亦走向衰落。伴随着日益严峻的人地矛盾（嘉庆年间，石屏州的人均土地占有仅0.8亩不到<sup>⑩</sup>），至晚明卫所的屯田制度几乎崩坏，大量军户向外地逃逸或被裁撤成为彻底的农民。

至明中期依靠官僚和士绅地主相勾结，兼并了大量军门屯户的土地，甚至包括“夷户”的耕地。史载，沐氏家族在正统四年（1439）已占有圃野田业360处<sup>⑪</sup>，至万历年间，其家族的庄田已达八千三十一顷三十七亩之多<sup>⑫</sup>。至万历年间，云南各都司官吏存在霸占屯田为私庄和贪污屯粮等行迹。随着明中后期卫所制度逐渐衰败，起初屯田军户的身份性质逐渐变异而成为纯粹的农民，在此条件下，严重的土地兼并局面无疑将加重以临安府为主的滇南各地的阶级矛盾。且石屏州的沐氏庄田和军田的赋税比民田更重，这是导致明后期石屏当地出现大量抛荒、外逃“走西头”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 四、移民开发新阶段：民族关系再平衡

石屏自古地处西南边陲，与交趾相接，自古便为化外之地，元以前本地区基本没有能够保持汉文化的内地移民，即便有移民迁入也为当地土著所同化了<sup>⑬</sup>。明时在云南设置布政使司，大举移民屯田，并在临安府境内设置流官，才改变了此地自古为土著自治的局面。

本地区的移民开发，符合学者对历代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开拓治理“三部曲模式”——即军事、政治、移民的判断<sup>⑭</sup>。洪武年间明廷对于边疆石屏州的统摄和管理亦是如此。据载，洪武十六年（1383），石屏州的官署设置有“知州、吏目衙、宝秀巡检司、宝秀驿丞卫、铁冶所、河泊所、四门便房、养济院、演武厅”<sup>⑮</sup>。而具有相当军事性质的驿堡<sup>⑯</sup>、关哨<sup>⑰⑱</sup>、亭铺等建制，在明初的设置规模明显更为庞大，且关哨、驿堡的选址大多在河流

① 萧廷对：《宝秀水利碑记》，载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志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

② 董雁伟：《明清云南高原湖泊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以石屏异龙湖为中心》，《思想战线》2018年第1期。

③ 杨忠亮：《朱州守生祠碑记》，载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

④ 《石屏彝族志》第一章《自然与人口》，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第40页。

⑤ 孙官生：《走西头——石屏商帮纪实》，民族出版社，2005，第13页。

⑥ 《滇系·沐英传附后嗣》，转引自《石屏县土地志》第三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第87页。

⑦ 《查庄田再疏》，转引自《石屏县土地志》第三章，第87页。

⑧ 刘永刚：《基层政治变迁中的权威、自主与制度——近百年云南宝秀镇为中心的表述》，第37页。

⑨ 古永继：《秦汉时西南地区外来移民的迁徙特点及在边理开发中的作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3期。

⑩ 康熙《石屏州志》卷三《建设志》，第82页。

⑪ 明《万历云南通志》卷五《建设志第二》，载方国瑜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六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第532页。

要冲和运输方便的交通干线上,由此构成了当时石屏州基层社会管理的主要力量。

明代基层社会组织以乡里制为主线,“多半是乡都图、乡都里三级,也有的地方是乡保村里、乡保区图四级”<sup>①</sup>。且历经初期里甲制向中后期保甲制的转型,前期里甲制与老人制、粮长制相结合,中后期所设保甲制则带有浓厚的治安色彩<sup>②</sup>。明初到康熙年间石屏州曾设置里甲制,史载“石屏州下设里,里下设甲,州城设铺。全州分设八里九铺,今宝秀镇属当时之昌明里和白邑里”<sup>③④</sup>,但是没有当地设置保甲制的记载,可见在明初到清初的时间段内,石屏州的基层政治建设并未与明廷整体设计同步,而是作为卫所制度的补充,与宝秀巡检司<sup>⑤</sup>一起,发挥着控制基层社会、防止地方土著势力动乱的作用。

自洪武十六年(1383)平定石屏土知州马黑奴叛乱,明廷大举迁徙军屯“填南”始,明王朝就不断通过设置卫所、设置亏容巡检司巡视监察土司地界内的军民情况、军事屯田、改土归流、推广儒学等措施与当地土司展开对地方社会控制权的争夺,明时石屏州所发生的叛乱不少皆与土司权力和皇权的斗争有关。例如:明洪武十年(1377),元代石坪州世袭土知州马黑奴被夺职,次年,马黑奴联合通海、宁州、蒙自等部酋长叛乱;嘉靖三十年(1551),元江兵变,本州筑土城防卫;崇祯九年(1636),阿迷州(开远市)土司万氏、沙定洲祸乱,以兵攻石屏、未能克<sup>⑥</sup>。

叛乱得以平息从表象来看得益于政府在滇南的驻军,尤其是临安卫下的石屏屯与宝秀屯的屯兵,但叛乱渐次减少与规模日小的真正原因则更在于中央王朝所推行的以夏变夷的文教政策的最终胜利<sup>⑦</sup>。“用夏变夷”的关键在于文化诱导以推动当地移风易俗,进而形成与儒学和宗族礼法直接相关联的基层制度场域和制度路径。随着“用夏变夷”的文化场域逐步在当地扩散,家谱编写、宗庙修建、文庙和各级书院建设以及各类礼仪规范都在石屏州社会迅速发展。

这个在明初才有汉族移民迁入开发、其时户口寥寥、藏于崇山峻岭的滇南偏州。在有明一朝的进

士人数产出位列云南各州县之第三,仅次于云南省府所在地昆明城、大理府所在地太和县与赵州的部分地区,不可不谓文风昌盛,当地人常说家乡乃是“举人满街走,秀才到处有”。由于明朝儒家文化在本地的广泛影响,此地的文教意识日趋兴盛,教育发达,科举人物众多(见表2)。至清初,甚至有“一家同榜三进士”之记录。从省级的布政使、参政到县衙的学正、训导,石屏籍产出的官员数量之多,堪为夷乡之冠。历经有明一带的开发治理,雍正年间石屏州因其民风淳朴、文风彬彬赢得了“文献名邦”的美誉,时任知州的龙为霖题联“山川东迤无境,文学南滇第一州”<sup>⑧⑨</sup>。

表2 明朝云南省各州县进士最高产四个区域人数统计表<sup>⑩</sup>

区域	明朝进士(人)
昆明县(大致位于今昆明市的盘龙、五化、西山、官渡四区地界)	51
大理市(明清时期太和县、赵州两地合并而成)	42
石屏州(即今石屏县,明时隶属于临安府)	10
建水州(今建水县,明时为临安府府邸所在地)	27

明初石屏州受文教之风影响,通过读书中举等方式进入仕途,造就了为数不少的一批石屏籍的官员。这些官员自从二品至从七品训导,数量不等,多为知州(多为边区土知州)、知县、县知事等正从五品官员(见表3)。此外还有大批读书人活跃在官府与乡间,官僚和知识群体与当地乡绅结合,在当地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士绅阶层。士绅阶层结合区域内巡检、驿堡、关哨、亭铺等军事性质的机构和里甲制的推行,深刻改变了石屏州原本的基层社会形态。明中后期地方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与管理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府逐渐倚重于新兴的士绅阶层来建立地方管理组织,这样遍行于内地的乡里制度与里甲组织在滇南社会被推广开来<sup>⑨</sup>。

表3 明朝石屏籍官员数目统计表<sup>⑩</sup>

官职	人数	官职	人数
布政使、参政	2	侍讲、侍读	1
提学使、学政	1	给事中、僉事	6
道尹、督粮道	3	通判、经历、参议	21
知府、同知	9	教授	16
御史	4	学正	10
知州、知县、县知事	33	教谕	20
县丞、县佐	12	训导	51
太仆、寺卿	2		

① 白钢:《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93,第137页。

② 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第25-59页。

③ 昌明里:即今宝秀西部山区及亚房子等地区;白邑里:即今宝秀坝。

④ 康熙《石屏州志》卷四《赋役志》,第92页。

⑤ 宝秀巡检司:洪武十六年(1383)在石屏州宝秀坝所设的官职,巡检司一般设于关津要道、要地,归当地州县管辖,巡检统领相应数量的弓兵,负责稽查往来行人,打击走私,缉捕盗贼。明初改革元代的社制,在全国编定里甲。但在云南汉族军事移民区这种里甲制度无法推行。为了管理军事屯戍区,巡检司则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控制基层社会的职能。

⑥ 《石屏县志》第一编《大事记》,第8-11页。

⑦ 刘永刚:《基层政治变迁中的权威、自主与制度——近百年云南宝秀镇为中心的表达》,第50页。

⑧ 张佐:《云南科举进士知多少(上)》,《云南日报》,2005年10月27日第9版。

⑨ 刘永刚:《基层政治变迁中的权威、自主与制度——近百年云南宝秀镇为中心的表达》,第47页。

⑩ 《石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石屏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内部资料,1988,第104页。

由于科层机制的普遍建立和新兴士绅阶层的推动，明中后期整个石屏州都在在汉族儒学文教的引导下，逐渐移风易俗，这在当地土著民族的谱系传承、建筑风格、科举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有突出表现。史载：“屏中各族，民国以前均有族长，订有族规。族规既定，督行如法律，或为禁行，或为规定，刻石列文，合族同村子弟人等，烙奉尊行。”<sup>①</sup>在强大的文化向心力驱引下，屏中彝人亦有相继被同化的趋势，古时土著彝人以父子联名谱系来构建“族群记忆”，但到了明末清初众多彝族受汉人取姓名习诗书的影响，除族属上有差异外，在文化上与迁入的汉人渐次趋同，各大姓宗族在宝秀地区遍建宗祠或家庙、修家谱，并定有众多家规与乡约<sup>②</sup>。

在有司衙署设置逐渐完善、汉彝融合长期通婚的背景下，当地彝民渐尊孔孟、习诗书、学文章。“自元建学设科，人才辈出。明清两代，文诞敷多士，更争自濯磨……文庙祭器乐章，皆有专设。”<sup>③</sup>随着学风愈盛，这个边疆偏僻小县逐渐以进士辈出而闻名，在此熏陶下，彝民的文化素质也大大提高，所谓“其英俊者，习诗书、学文章，游洋者多不乏文人，现有登甲榜者”<sup>④</sup>，又称“土人中罗罗最慧，几同化于华族，科举时有冠乙科登甲榜者，可称也”<sup>⑤</sup>。

## 五、结语

明至清初，汉族移民和周边土著民族间的关系变迁与当地的资源占有和人地矛盾息息相关，而此

关系变化主要受到汉族移民在当地的开发建设的影响。

首先，汉族移民的到来造成了对当地土著民族生存空间的挤压，客观上与彝族为代表的当地土著民族形成了“对立”态势。为了凝聚族群力量，打破世袭土酋对当地基层社会的控制，汉族在迁徙到新的环境并长期居住的过程中，以原籍文化为基准不断构建“族群边界”，由此形成初期的“移民文化孤岛”。并且由于土著民族更适宜“刀耕火种”和“畲山为田”的生产方式，故而在明初民族矛盾并未大规模爆发。

其次，随着湖区农耕经济发展，不断吸引外来商人和民众到来，士绅阶层壮大逐步掌控基层社会，以“沐氏庄园”为主的地主私有土地的逐步膨胀，明末战乱不休等原因，使得在万历年间，石屏州的人地矛盾严重激化，土客对立也达到极点。在此情况下，部分具有开放商业意识且敢为人先的汉、彝居民选择向外“逃生”而走西头，使得明末到清初石屏州人口大幅减少，客观上极大缓解了当地严峻的人地矛盾。此后清王朝进一步在滇南的“江内”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并着手治理当地吏治、肃清分裂势力，这又使民族矛盾得到缓解。与此同时，汉族移民与周边民族交往逐渐从“排他”走向“融合”，在文化认同的向心力作用下石屏社会“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sup>⑥</sup>逐步形成。

[责任编辑 张勇]

## On Development of Immigrants and Change of Ethnic Relations in Southern Yunnan during Ming Dynasty: a Study of Shiping

BAI Yi-ge

(School of History &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Shiping Prefecture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mmigration policies in southern Yunna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border order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a large number of Han ancestors were ordered to “fill the south” and came to Shiping in southern Yunnan. In the mid Ming Dynasty, local Han gentry successfully transplanted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l of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 changing the long-standing situation of grassroots society being controlled by local chieftains.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 local conflicts between people, land, and ethnicity reached their peak but were finally alleviated.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dominant centripetal force of Han immigrants, Shiping in southern Yunnan gradually moved toward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ethnic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Key words:** Han Chinese immigrants in Ming Dynasty; Shiping Prefecture in southern Yunnan; construction of immigrant order; ethnic integration

① 《石屏县志》第三章《人口》，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680页。

② 民国《石屏县志》卷七《学校志第七之一》，第109页。

③ 康熙《石屏州志》卷二《地理志·风俗》，第73页。

④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重要概念，最早由费孝通先生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的“泰纳讲演”中提出。其核心内涵在于“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即众多文化各异的不同民族在悠久的中华民族形成史长河中，逐渐形成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家国认同、共同的文化基础的格局。